



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的外国名言

“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 李德鹏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4年9月5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引用了非洲谚语“同路人才是真朋友”，表达了中方愿与非洲国家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共促合作、共谋发展的坚定信念。在历史上，非洲各国受殖民统治的影响，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多元融合特征，因此非洲被称为“多元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非洲的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谚语和俗语，它们通常以自然景观、动物和日常生活为喻，生动形象地表达深刻的智慧和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同路人才是真朋友”这句谚语出自南苏丹丁卡语。南苏丹位于东非，人口约1500万人，有64个部族，丁卡是其中之一，也是南苏丹最有影响力的部族。这句谚语生动地表达了非洲人对真正友谊的深刻理解。

非洲谚语中常以共同经历、并肩奋斗的经历来衡量友谊的真挚，这种用生活中的共同历程来体现友谊的方式，体现了非洲人对友情的珍视以及对共同发展的美好期盼。非洲谚语有许多涉及朋友关系的表述。例如，“独行快、众行远”，强调了个人行动虽然迅速，但只有集体合作才能走得更远；“一只手无法将葫芦罐子放在头上”，指出单靠个人力量难以完成复杂的任务，需要集体的协作和支持；“在涨水的季节给你鱼吃的人是你真正的朋友”，则突出了在困境中提供实际帮助的人才值得真正珍惜

的朋友；“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进一步说明了合作和团队力量的重要性。非洲社会特别注重乌班图精神，这一词语在南部非洲语言中意为“我们在故我在”，强调共同体意识和相互依赖，倡导人们在集体中互助共济，个人的存在和价值依赖于他人的支持与互动。非洲人认为，真正的朋友不仅仅是那些在快乐时光与你同享的人，更是那些在逆境中与你并肩作战的人。正如“同路人才是真朋友”这句谚语所揭示的，真正的友谊是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在共同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更加显现其深厚。

中国文化中对同路者和朋友的重视与非洲文化中的观念不谋而合。中国古典文献中，许多经典篇章都强调了与志同道合者同行的重要性。《易经》中的“同人于野，亨”象征着志同道合者能够超越地理和空间的限制，携手并进；《周易·系辞》中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则彰显了团结协作的强大力量；《道德经》中的“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阐明了与“道”同行才能得到庇佑的智慧；《墨子》提到“兼相爱，交相利”，强调志同道合者应彼此关照，基于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和“独木不成林”则生动地指出集体力量的必要性，凸显互助合作的紧密关系；“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进一步揭示了共享共荣的道理；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则表达了即使相隔千里，心意相通的朋友依然如邻居般亲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即使地理上相隔遥

远，那些愿意在共同旅途中与我们一起经历风雨的人，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

中非数百年来的交往互动堪称友谊历久弥坚的典范。早在汉代，中国与非洲之间就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古代的中国商船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穿越印度洋，抵达东非海岸，促进了中非之间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历史记载中，中国与非洲的民间往来也十分活跃，彼此之间的友谊历经岁月长存。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国家纷纷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非友谊迎来了全新的篇章。中国坚定支持非洲人民的独立事业，为非洲的独立斗争提供了重要援助和支持。坦赞铁路的建设就是这一友好合作的生动象征。坦赞铁路横跨非洲东部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全长1800多公里，历经近6年修建最终于1976年正式通车，是中国援建的最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坦赞铁路的建设不仅见证了中非友谊的深厚历史，更成为两国人民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象征，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自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坚定支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关系日益成熟、稳定、活跃，双方在合作中不断提升彼此友谊的深度与广度。在经贸领域，中国连续15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2821亿美元，展现了双方经济合作的强大韧性。在投资领域，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涵盖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多个关键行

业，为非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动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合作项目涵盖了铁路、公路、港口、电力等领域。目前，中国企业已在非洲各国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过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输变电线路6.6万公里、骨干通信网络15万公里。在金融领域，中非之间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双方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合作体系。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宣布中国将向非洲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约507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旨在支持非洲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从丝绸之路上的古代商船，到20世纪的坦赞铁路，再到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友谊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参天大树，在风雨中历经考验，愈加茁壮成长。这份友谊，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已成为中非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美好象征。

同舟共济，继往开来。数百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携手同行，彼此扶持，缔造了跨越大陆和大洋的深厚友谊。这份友谊历经岁月风雨，不断深化和升华。展望未来，在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非双方将继续秉持“同路人才是真朋友”精神，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谱写中非友谊与合作的新篇章。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 张 瑾

日本综合施策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体系

积极鼓励婚恋和生育。日本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婚恋和生育的措施。政府为婚恋活动提供帮助，对结婚和年轻人家庭给予援助，提供结婚、怀孕、分娩、育儿知识，营造支持婚育的社会氛围。例如，地方政府成立结婚志愿中心，举办相亲活动，进行结婚意愿配对，设置专职红娘提供服务。扩大幼儿教育免费化，重点帮扶三代同住和多孩家庭。从三孩开始给予免除照护费用，对育儿家庭给予援助，扩充课后儿童看护班等措施。但2023年日本总和生育率降至1.2，反映出婚姻和生育行为与人口年龄结构、社会文化等特征关系密切，具有较强惯性。

保障和稳定老年人就业。2013年，日本修订《高龄者雇佣安定法》，明确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将在2025年4月把企业义务雇佣年龄提高至65岁。2021年4月，将延迟退休年龄上调至70岁，稳定了老年人收入来源。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在老年人家庭全部收入中，公共养老金比例为100%的家庭占全部的41.7%，公共养老金比例为80%—100%的占17.9%，65岁以上男性平均每月养老金15万日元，平均消费支出14.8万日元。因此，主动选择“延迟退休”，继续在职场工作，成为不少老年人的选择。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00年日本建立了独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重组了“老人福祉”和“老人医疗”两大体系，明确了保险对象的范围界定、认定程序、筹资结构、中央地方分权、服务机构、服务内容等方面，明晰了支付与负担的关系，完善了老年人的生活照护服务体系。这一制度的建立，使得老年人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所需的护理服务，同时也减轻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建立综合性社区照料体系。为了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日本自2011年起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行改革，目标是在2025年构建出能够在社区中提供各种为老服务的照料体系。规划在30分钟通行半径内设置“综合性社区照料支援中心”，配置护理支援专员负责咨询和协调，提供长期护理、医疗保健和日常生活支援等养老

服务，包括寄宿式养老服务，甚至当老年人需要强度很高的长期照料，如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时，都可在社区中获得需要的服务。

吸引外国护理劳动力。日本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国护理劳动力的措施，包括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护理人才签证优惠和《亚洲健康倡议》。2017年9月实施的《出入国管理难民认定法修订案》中新增了“护理”留日资格，规定赴日进行护理专业学习和实习的外国人可获得最高5年的留学签证，若通过“介护福祉士”职业资格考试则变更为护理签证，可一直留在日本。这些措施补充了日本国内护理力量，也为外籍护理人员提供了良好就业机会。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将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点工作。日本实践探索表明，仅靠经济激励措施不足以显著提高生育率，需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深层次变革。例如，通过优化结婚生育环境、活用科技成果等多方面施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提高生育率并非短期可以见效的任务，需要长期投入与持续努力。因此，制定政策需注重综合施策，鼓励家庭价值观，从物质激励、婴幼儿照料及社会保障政策入手，构建支持生育的全方位社会环境。从战略高度理性认识树立积极老龄化理念的重要性。日本通过立法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利，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参与社会活动。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老年人的常识、智慧和经验是社会的宝贵财产。经验显示，需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树立积极老龄化理念，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通过建设老年友好型环境，挖掘低龄活力老年人潜力。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前为老年生活做好经济储备，实现积极老龄化。

将促进和改善老年人健康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优先选项。日本通过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确保了老年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全方位、全周期地维护

全体人民的健康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其经验可见，在政策制定方面，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观念出发，坚持预防为主，积极倡导和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之中，建立和完善以“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和安宁疗护”为主要内容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促进老年健康服务的“系统连续”和“公平可及”，推动实现“健康老龄化”。此外，还需培育和壮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不断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重点完善筹资、待遇政策体系，建立统一的护理需求认定和等级评定等标准体系，完善服务质量评价、定点机构协议管理和费用结算等办法，深化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以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权益。

将构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支持系统作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日本通过制定老年人就业雇佣制度，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不仅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还增强了社会活力。日本实践经验显示，老年人的权益不应仅仅停留在接受服务的层面，更应体现在他们能够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其经验揭示，出台老年人创业和就业促进政策，应制定老年人就业雇佣制度，政府对雇佣员工延迟退休的单位给予补贴和奖励；鼓励知名学者、经济学家、老艺术家等高端人才到智库等单位工作。鼓励老年人创业，给予资金、税收、知识、技术和环境支持，对退休后就业和创业的收入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建立保持老年人工作积极性的制度体系，建立完善老年人机构，制定老年人再就业反歧视法律，取消老年人在职业技能考试方面的最高年龄限制、最低学历限制等硬性规定。建立适老工作就业环境，提供档案管理、培训师、咨询顾问等适合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建立老年人才就业市场，以此来构建一个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系统。



当前，有关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探讨日渐成为热门话题。事实上，区域国别学不仅是“大学之学”和“书斋里的学问”，更是“大国之学”，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和经世致用特征。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区域国别学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总体看，区域国别学与外交决策之间是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

区域国别学对外交决策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知识体系为外交决策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区域国别学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地缘政治学、国际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新闻学、法学等不同领域，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可以避免单一学科和理论视角的偏狭，以各学科理论和视角的综合来提供完整图景和总体性知识，由此帮助决策者理解复杂的国际环境与各国行为逻辑。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一级学科，还承担着产出普遍理论的功能。认为只有详实而细节的信息才有益于决策者的观点是片面甚至错误的。相反，基于生理学意义上大脑的认知特点，决策者往往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条件去处理、辨别、分析和理解过于细碎、庞杂的信息。因此，简单、抽象的理论对领导人决策反而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因为理论本就是人脑认知力存在限度的产物。

通过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区域国别学为外交决策提供实时、准确的情报支持，助力决策者做出基于充分信息的判断。区域国别学设立旨在实现的一大功能就是“知己知彼”。区域国别学重视语言人才的培养，旨在培养能够在研究对象国进行更高层次的社会交往的研究者。区域国别学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政府及各界民众直接接触，获得的大多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对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缺乏感性知识，很可能给决策带来不利影响，导致决策失误增多、方向偏离或难以有效落实等情况。对于区域国别学研究者来说，基于对象国独特的历史传统、战略文化和语言习惯对情报进行富有人文色彩的解读是必不可少少的，这有助于决策者透过表象，洞悉“事实”背后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基于对区域国别特性的深刻认知，区域国别学能为外交决策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处理、经济合作模式的选择、危机应对策略的设计等。与国际关系学有所差别的是，区域国别学重视特殊性的知识，来服务于更加精确和及时的外交决策。这并不是说，感性知识可以代替专业知识或直接作为决策的依据。例如，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一般被视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路径。从对策的角度来说，过于依赖感性知识并不必然提升决策效率，甚至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基于此，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学科实践中提供学理化的标准和指标，来为决策“服务”，来保证我国的外交决策“讲证据、得人心、负责任”。

外交决策对区域国别学的实践检验与学科发展推动

外交决策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是对区域国别学理论与分析的有效检验。成功的外交实践验证并强化相关理论，失败的案例则催生反思与理论修正。理论是抽象的，但创造和使用理论的人基于不同的国家、语言、教育、文化背景，对知识的生产和使用则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例如，西方一些国家情报界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走向的误判，就是因为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主张，断然不相信宗教势力是推动革命的主要力量。实际上，外交实践则可以对区域国别研究起到校正和纠偏作用。

外交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与战略需求，不断驱动区域国别学研究关注新的焦点、拓展研究边界，如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全球治理议题等。外交需要决定区域国别学的关注重点。在西方，近年来的区域研究愈发关注特定地区儿童健康、女性权利、少数群体权利、司法权益、选举政治、移民与难民、国际援助等议题。我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一些与国际研究前沿接轨的成果，但不可

区域国别学与外交决策是什么关系

□ 田文林 李嘉伟

盲目模仿其研究模式而使得研究与我国的需求偏离。

国家对关键区域与国别的外交重视，往往会带动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投入增加，从而推动区域国别学的整体发展。目前，中国对兼通对象国别（区域）语言和国际关系状况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高涨，要尽快解决专业人才供需脱节问题。美国的区域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支持研究者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并建立个人社会联系网络，这就需要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美国的区域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因资助减少，导致那些最优秀的研究生转向更具理论性或功能性的政治科学，这使得美国的区域研究一度受挫。

区域国别学与外交决策的动态互构与协同发展

区域国别学与外交决策形成一种动态的双向反馈机制，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两者在互动中共同演化。对决策者来说，需要区域国别研究来提供对于特定国家具体事件的解释及某些发展趋势的预测。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但对区域国别问题的解释不能满足于仅用“国情”“文化”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而是有必要解析背后的逻辑并上升到理论高度。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区域国别学与外交决策需进一步加强融合，创新研究方法 with 决策模式，提升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要求加强协同，发挥不同研究主体的优势。高校和科研院所具有学科背景优势和人才培养优势，应着力挖掘研究人员兴趣和特长，通过稳定的投入和专业的学科建设，注重基础研究，关注中长期议题。驻外使领馆和社会智库，应当为解释中长期议题提供助力。

在国家整体战略框架下，区域国别学应更紧密地服务于外交决策，共同推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力求做出最精确、最有价值的研究。同时，国家战略也应更加明确地引导和支持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方向，这将决定区域国别学投入、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点。

